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4.001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铁血湘西》专辑

主持人:河北大学刘起林教授

[主持人语]湖南辰溪籍作家邓宏顺功底深厚、创作勤奋,是一位具有丰富文学实绩的作家。在其 3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在《收获》《当代》《中国作家》等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 50 余部、短篇小说和散文 100 余篇。作品屡获《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并在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多次获奖。其长篇小说《红魂灵》《贫富天平》和《天堂内外》,以对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深切忧思震撼人心。2015 年,邓宏顺创作出版了 68 万字的长篇新作《铁血湘西》,笔力雄健地展开了现代湘西几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生活画卷。作品出版后深受好评,2015 年 12 月在“《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评选的网络投票中获得第一名,2016 年 4 月被评为“2015 年湖南省十大优秀图书”。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铁血湘西》专辑”,特邀刘起林、岳凯华、罗宗宇、周会凌等四位省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和阐释《铁血湘西》,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这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研究。

《铁血湘西》:“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刘起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文学湘西”存在三种审美境界,即诗意自然的湘西、风土民俗的湘西和乱世铁血的湘西。邓宏顺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围绕土匪张玉琳“玩枪”“拖队伍”和中共地下党陈策搞武装建立“湘西纵队”两条线索,正面开掘“铁血湘西”的审美资源,展开了现代湘西乱世中的乱局与险象,具有鲜明的“文学地方志”特性。作品显示出一种以历史大势为框架展开和判断乱世人生的“正史”气象,但也存在以事带人而影响人物典型化、历史味重而人文气息略有欠缺的局限。

[关键词]“文学湘西”;《铁血湘西》;乱世历史;“正史”形态;文学地方志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4-0001-04

Blood and Iron West Hunan:

Literary Local Chronicles of “Official History” Form

LIU Qi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esthetic realm of “literary west Huna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est Hunan of poetic nature, west Hunan of folk customs, west Hunan of chaos and wars. Deng Hongshun’s novel *Blood and Iron West Hunan*, around the two story lines of bandit Zhang Yulin’s “taking up the gun”, “raising a force” and underground CPC member Chen Ce’s “taking up arms”, “setting up the western Hunan troop”, excavates the aesthetic resources of *Blood and Iron West Hunan* and describes the turbulence and dangers in the chaos of western Hunan, which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local chronicles”. The work shows an “official history” feature of describing and judging life in turbulent times 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

ical trend, 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hat affect the typicaliz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humanistic flavor of writing.

Key words: “literary west Hunan”; *Blood and Iron West Hunan*; history of chaos; “official history” form; literary local chronicles

湖南著名作家邓宏顺以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取胜,具有丰富的创作实绩。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红魂灵》《贫富天平》和《天堂内外》属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邓宏顺审美视野是当代中国,关注焦点是那些在政治体制中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又具有严重性和紧迫性的重大问题,实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清理,审美境界体现出内涵之实、立意之高和态度之诚有机统一的特征。《红魂灵》在革命文化本位和建设文化本位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对比的意义格局中,深刻地剖析了落后于时代的“红魂灵”所存在的局限性、悲剧性和危害性。《贫富天平》从“贫富天平”这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立命之本出发,探讨了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官员所应该具有的从政立足点和人格品质,以及这种立场与品质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天堂内外》以当代中国“60年”为背景描写当下社会“30年”的农民命运,生活图景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极为本色真实,深刻而动情地揭示了社会高速发展却人欲膨胀、失范无序的时代环境带给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心灵悲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由政治眼光、底层意识和思想高度所共同熔铸成的审美力量。

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则将艺术的笔触深入到了湘西大地的现代历史风云之中,开启了邓宏顺小说创作的新视野和新境界,即从过去提炼生活、“以论为主”的境界,进入到了一个将史料发掘和思想眼光相结合的、“以史为主”的审美新境界。这部作品堪称是一部以“乱世湘西”为审美对象的、“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

《铁血湘西》的审美境界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值得称道与重视的特征:

首先,从整体意蕴建构的角度看,《铁血湘西》显示出一种为“小地方”建构“大叙事”的审美大格局和创作大气象。

《铁血湘西》以湘西乱世中的乱局和险象为中心,根本艺术意图显然是要为现代辰溪这个“小重庆”写一部史传甚至史诗性的作品。作品的事情情

节实际上存在两条线索:一是陈策等共产党人搞地下武装,二是张玉琳玩枪拖队伍。情节的演变发展则存在两个关节点:作品的前两部以陈策搞地下武装的成果遭到破坏、陈策本人被抓和被营救为关节点,后两部以张玉琳打开汉阳兵工厂抢枪为关节点。以这样的基本框架为中心,作者对现代湘西千头万绪的历史矛盾和层出不穷的大小事件,既全面展开而又条分缕析,从而层次丰富、枝叶纷披却散而不乱地建构起了文本的基本意义框架。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由“乱世湘西”这一历史时空向外拓展,充分揭示种种地方志性质的事件与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共党争的时代风云之间的复杂关联,另一方面又将他了若指掌的湘西人文地理、风俗民情,巧妙地编织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于是,作品的情节发展步步推进、渐入佳境,辰溪那战乱时期“小重庆”性质的历史生活景观,就得到了丰富有力的表现。在对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作者还表现出一种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的艺术笔法和大开大合、举重若轻的艺术气度。

其次,从社会历史认知的角度看,《铁血湘西》表现出一种既充分展开历史矛盾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深刻有力地揭示历史大势的“正史”姿态。

不管是对张玉琳玩枪拖队伍,还是对陈策搞武装建立“湘西纵队”,《铁血湘西》都坚持原原本本地“从头讲起”,其中所遵循的根本叙事原则,就是“以史为本”。同时,作者又以玩枪拖队伍是报仇雪恨,建立强权还是抗日救国,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来作为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点。这两方面的特征相结合,作品就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在开放的历史视野中认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正史”立场。作品中内容坚实、视野广阔的描写,则有力地支撑了这种价值立场。地方士绅形象的描写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从国民党任命湖大校长引起学潮,到向绍轩辞去桃源中学校长民众留恋,这种种精彩的描写既充分展示了历史矛盾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又有力地体现了历史乱局中的人心向背。大湘西“遍地枪炮”中形形色色的队伍在国共之间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最终结局,也充分体现出历史大势不可悖逆的客观规律。众多的相关描写,使《铁血湘西》既超越了传统“红色文

学”创作的审美视野,又清晰地表现出一种中国当代“正史”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姿态。

再次,从世道人生理解的角度看,《铁血湘西》表现出一种将社会历史道路与个体人生道路纳入同一视野审视,进而以历史大势为框架判断乱世人生的思想眼光。

张玉琳从小热衷于玩枪拖队伍,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心怀壮志而难以大显身手,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深陷个人复仇和杀人做强者的阴影中难以自拔。张中宁不愿在家乡结怨,只愿“在天上布云下雨”,对老师陈策始终心怀感恩,这表明他的个人品格其实并不差,而且,他也有过奋起抗击外敌入侵的壮举。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明知历史大势所趋,张中宁却陷入功名利禄和个人名节的误区中难以自拔,自取其辱的人生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作者通过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试图证明: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个体的人生问题和社会的政治走势密不可分,而且,为个人利益而拖枪杀人、呼风唤雨的英雄好汉,只能是黑夜的小星星。正因为作者坚持从历史大势的高度审视个体人生,《铁血湘西》的人生价值判断就显示出深度和力度兼具的思想特征。

第四,从地方历史文化发掘的角度看,《铁血湘西》充分展现了现代湘西人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特质。

作者虽然随处点染和勾勒了大湘西的自然山水、地理风物,也描述了诸如放蛊、赶尸之类的诡异民俗,但《铁血湘西》对于湘西人地方特质的揭示,主要是依靠再现当地的乱世生态来实现的。每有强悍之徒玩枪拖队伍,本地人就纷纷参加;土匪每到一处就杀人放火,将之视为家常便饭;土匪之间,其实是本地人之间,时常地相互争夺、报复和残杀;乱世中充满着灾难和险象,普通百姓则只能忍受宰割或铤而走险。凡此种种,深刻而饱满地展示了地方势力各霸一方、底层百姓备受摧残的独特历史景观,从而客观而忠实地解答了现代湘西为何充满着“铁血”气息的问题。

二

《铁血湘西》的审美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创作性质的角度看,《铁血湘西》属于“文学地方志”性质的历史题材创作。

新世纪以来,以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料、“地方志”文献为基础的创作涌现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大致表现出以下几种审美路径:第一种路

径是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之类的“非虚构写作”,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功夫令人叹服,以史料的丰赡和内涵的深广取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非虚构写作”实际上就是没有将历史文献的真实转化成以“艺术境界”为核心的“艺术真实”。第二种路径可以红柯《西去的骑手》为例,这部作品着意于发掘历史生态中蕴藏的某种精神特质,具体说来着意渲染西部历史中的血性精神,因此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文本审美境界实际上是精神感染力大于历史认知意义。第三种路径可以阎连科的《炸裂志》为代表,阎连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虽然也号称要建构一种文学性质的“地方志”,但《炸裂志》实际上是一种“新历史主义”性质的象征、寓言化叙事。学术界曾出现过关于《炸裂志》存在“概念化”倾向的争论,根源就在于这部作品缺乏具有生活根基的意蕴层次感。和这些作品的审美路径相比较,《铁血湘西》在创作中所坚持的,其实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叙事原则,所追求的其实是历史再现、“诗”“史”融合的价值目标。所以,《铁血湘西》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文学性质的创作,作品所建构的是一种“文学地方志”性质的审美境界。

其次,从文本具体内涵的角度看,《铁血湘西》有力地丰富和深化了“文学湘西”的意蕴格局。

以沈从文的众多经典作品为源头和代表,“文学湘西”的审美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源远流长。总体看来,建构“文学湘西”存在三种审美境界:一是诗意自然的湘西,二是风土民俗的湘西,三是乱世铁血的湘西。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三种审美境界的建构都有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孙健忠的《醉乡》和《甜甜的刺莓》、蔡测海的《远去的伐木声》、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等获得过全国性大奖的作品,充分表现了折射着时代气息的湘西地域生态的独特诗意。在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思潮中,孙健忠的《死街》和蔡测海的《母船》等作品,着力于建构一种神秘、诡异、近似于湘西巫巫文化的审美境界,其中充分体现出湘西民俗文化的精神独特性。不过,当代文学史上的湘西题材写作,实际上还有一类社会影响广泛却往往被学术界所忽视的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作家张行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武陵山下》,到新时期之初著名小说家水运宪所创作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再到新世纪之初黄晖所创作的电视剧《血色湘西》,这些作品都以传奇化的叙事,来表现具有“铁血湘西”性质的审

美境界,也形成了一种具有贯穿性的文学作品系列。应当说,这三种审美境界合起来,才是“文学湘西”独特艺术景观的全部内容。

新世纪以来,“文学湘西”的审美建构出现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总体看来,向本贵众多的作品和邓宏顺的《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等前期作品,皆处于全国性视野的“农村题材”的审美范畴之中,“文学湘西”的特色并不鲜明。自然生态层面的“诗意湘西”境界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也显得较为薄弱,最著名的当属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那种舒缓温馨的境界与其说是缘于民间良俗,不如说是缘于天人合一的湘西自然生命形态。对于“民俗湘西”资源的艺术开掘则成果丰硕、引人注目,《湘西秘史》《算军之城》《巫师简史》等广受关注的作品,都以湘西传统的生存样式及其历史演变为审美重心,着力建构着“民俗湘西”的意义境界。

从这样的文学发展格局中来看,《铁血湘西》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全景性叙事、全方位呈现,来“正面强攻”“铁血湘西”审美资源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审美重心很明显是现代湘西乱世中的乱局与险象,它虽然也表现了“自然湘西”和“民俗湘西”范畴的审美内涵,但相关描写被限定在展现湘西乱世历史景观的意义框架之中,是为建构“铁血湘西”的审美境界服务的。

展现“铁血湘西”范畴的审美资源,也可以形成多种意义格局。如果作者以湘西人在铁血生涯中所表现的血性与强悍为艺术聚焦点,所建构的就是一种历史为表、文化为里的“民俗湘西”的意义格局;如果作者只展现“湘西纵队”的形成历程而撇开张玉琳玩枪拖队伍的线索,则是一种典型的“红色题材”的创作思路;如果作者围绕张玉琳抢枪导致湘西“遍地枪炮”的局面和共产党的剿匪过程来展开故事情节,那么作品就不可能摆脱叙事的传奇性特征。《铁血湘西》将两条线索同时展开,坚持一种对历史进程原原本本地“从头道来”的叙事原则,作品的“文学地方志”品格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再次,从审美文化倾向的角度看,《铁血湘西》成功地提供了一种视界开阔、意蕴深广而切实可靠的“中国经验”。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界大力提倡展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众多的作家则热衷于发掘边缘性的题材与文化资源,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表面上看良性互动、相互呼应的关系。令人遗憾之处在于,许多作品属于鲁迅所说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1]的创作,主观化、意象化的审美境界所呈现的,甚至往往是各种边缘地区的伪民俗、假信息,所以,相关作品虽然显示出一定的文学才情,但缺乏真正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铁血湘西》所显示的,则是一种文献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境界。从审美文化的高度看,这种艺术选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铁血湘西》虽然坚持“诗”“史”融合的艺术努力方向,但总的看来,这部作品尚属“地方志”“史传”性质的审美境界,并未达到“史诗”的艺术高度。其中的关键性局限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叙事格局属于以事带人的性质,虽然众多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都描述得生动而鲜明,但重头人物的形象未曾处于文本意义建构的核心位置,也未曾真正达到“典型人物”的艺术高度;二是作者对历史内涵的挖掘与呈现重于对人的灵魂的理解与感悟,文本审美境界显得历史味重、精神和人文气息却相对薄弱。

在《铁血湘西》两个具有贯穿性的核心人物之中,张玉琳的形象无疑比陈策的形象塑造得更为成功,而且就其性格内涵来看最有可能成为独特的艺术典型。但在文本意义具体展开的过程中,作者是把张玉琳放在历史的大变局中,作为“局中之棋”来看待的,他的许多行为抉择也都被纳入社会历史性的判断中来表现,对于张玉琳身上原本存在的、在人生迷宫与困局中的精神矛盾和心理痛苦,作者却未曾更充分而正面地展开。这样一来,文本审美境界的底蕴就显得过于清晰,审美意味的多元性则必然地存在欠缺。也就是说,《铁血湘西》对于乱世人生的困苦与艰难这生命层面的内涵,表现得有欠丰厚、也不够震撼人心。

所以,如何在建构历史大格局的同时又有力地突出人物形象的地位,如何在展现历史深广度的同时又显示深厚的人文底蕴,从而在形成叙事完整性的同时又大幅度地拓展文本的艺术张力,从而建构起一种极具审美难度的“史诗”性艺术境界,就成为邓宏顺在同类型题材创作中所面临的更崇高的艺术目标。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04.

责任编辑:黄声波